

■世象纵论

电话问卷调查,答不答?

□余 剑

电话铃声响起,接听,传来普通话语:“您好!我是上海市统计局的调查员,占用您几分钟时间,询问一下疫情过后您的消费意向。”我不假思索,就用上海话回绝。对方急切地换成上海话“就两分钟,好伐?”接着连珠炮似地“年龄段”“有无购房意向”“有无装修意向”“有无购车意向”……,由于她的上海话,拨动了我的恻隐之心,一一回答了她。很快,对方用上海话说“结束了,谢谢侬!”

先得声明一下,因为家里的座机没有开通来电显示,我无法证实这个来电是否是上海统计局的,权当其是市统计局的吧。还需声明一下,回绝普通话的电话问卷调查,绝没有贬低普通话或歧视外地人的意思,只是臆列接到不熟悉的普通话电话,都是五花八门的骚扰电话,令人不胜烦恼,更何况常见关于电话诈骗的新闻报道。所以,生怕接听后被七绕八绕地拽进陷阱。

■并非闲话

众志成“诚”

□石 路

一段时期以来,诚信缺失问题频频发生,已逐渐侵蚀到社会“肌体”,令人深恶痛绝。于是乎,各行业治理行动,剑锋所指,声势浩荡,深得舆论赞赏。可问题是,怎样让“诚”化作社会良序发展的基石?如何使“信”成为一项人人遵照的自觉行为,这很值得人们花力气深思。

孔子曰:“民无信不立。”孟子曰:“诚者,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”

讲诚信,是一个人最起码拥有的道德品质,就像“诚信老爹”吴恒忠说的那样,“人,就得讲个‘信’字。”有了信用,自然就受到别人尊重,自然也能感动他人。莎士比亚说:“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。”松下幸之助说:“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,也是无形的财富。”

前不久,有友讲到一则《尼泊儿的少年》故事,听来颇觉感慨。

早年,尼泊儿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少有外国人涉足;后来,许多日本人到这里观光旅游,据说这源于一位少年的诚信。

一天,几位日本摄影师请当地一位少年代买啤酒,这位少年为之跑了3个多小时。第二天,那个少年又自告奋勇地替他们买啤酒。这次,摄影师们给了他很多钱。但是,直到第三天,那个少年还没回来。

于是,摄影师们议论纷纷,都认为,那个少年把钱骗走了。第三天夜里,那个少年却敲开了摄影师的门。原来,他只购得4瓶啤酒,尔后,他又翻了一座山,趟过一条河,才购得另外6瓶啤酒,返回时摔了3瓶。他哭着拿着碎玻璃片,向摄影师交回零钱。

在场的人,见此情景无不动容。这个故事使许多外国人听了之后深受感动。后来,到这儿的游客也就越来越多。

我国古有许多诚实守信的典

假作真时真亦假。不得不说,由于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,让一些正常的问卷调查电话难以进行,也是苦了电话问卷调查员,一天打出几十乃至上百个的电话,任凭扯破了嗓子,想必得到回复的寥寥无几。如果有政府部门、社团或者企业,确需开展问卷调查的,不妨从形式上有多样化。

十多年前,我曾是上海统计局的志愿者,做过市民的问卷调查。那时的做法是质朴的,动用自己的人脉,选数个居民区,每个居民区三、五十份卷子,请居委会干部发放到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中,指导督促完成,如此获得的意向和数据相对真实。

当然,如今的社会,与十多年前有很大的差别,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,市民生活精彩纷呈,对于问卷调查不屑一顾或懒得搭理;还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加强,贸然打电话给别人,首先引起的是别人情绪的对立:

型事例,《曾子杀猪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曾子原名曾参,是孔子的学生,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、儒学家,也是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。他博学多才,且十分注重修身养性,德行高尚。

一次,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,年幼孩儿吵着要去。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,便对他说:“你在家好好玩,等妈妈回来,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。”孩子听了,非常高兴,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。

这话本是哄孩子说着玩的。过后,曾参的妻子便忘了。不料,曾参却真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。

妻子见后,就说:“我是为让孩子安心在家,才说等赶集回来把猪杀了烧肉给他吃,你怎么当真?”曾参说:“孩子是不能欺骗的。孩子年纪小,不懂世事,只得学习别人样子,尤其以父母作为生活榜样。今天你骗了孩子,玷污了他的心灵,明天孩子就会欺骗你、欺骗别人;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,明天孩子就会不再信任你,你看这危害有多大呀!”

诚信,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,代代相传。《曾子杀猪》《韩信报恩》《一诺千金》《孟母教子》《宋江看瓜》等,皆留下传世美谈。

进入新时代,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大力传承与弘扬“诚信精神”,是公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要内容,也是人人应该遵循的社会规范。

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——“当代愚公”黄大发、“守边老人”魏德友、“大山卫士”刘真茂、“良心秤”传人江玉珍江远斌姐弟、为牺牲战友守墓40余年的退伍老兵艾买尔·依提、凭良心建房的农民工马虎、最美“厕所管理员”李影等,他们就是诚信标杆、就是人们深感为荣、引以为傲的学习典范。

“我的电话信息你是怎么获得的?”所以,此类电话问卷往往收效甚微。

以我普通市民的想法,对于问卷方面而言,应该把准时代脉搏,设计出行之有效的问卷调查形式与方法。比如:在可信度上确保问卷调查能够进行,在问卷形式上生动活泼,内容上简洁明了……。经常看到电视新闻中对于社会热点话题调查,采用在公共场所用简单的问句随机采访,因为有话筒、摄像机、挂牌等记者的标签;而且公共场所,可信度较高,被采访者比较乐意接受。否则,如大海捞针般地打电话碰运气,逮住一个是一个,不仅是资源的浪费,也免不了荒腔走板,更有损调查员的健康,至少“胖大海”“润喉糖”是必备品吧。

电视采访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形式固然好,然而“小众”的,欲获得厚实真实性强的数据,通过最基层居委会的常规操作更有效。发动社团志愿者参

与,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、在大型超市、在公园绿地等开展,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,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意义。对于调查人员,除了挂牌上岗,还应该懂点社会学和心理学,能与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的人说得上话;对于接受问卷的市民,赠送一件与调查内容相关的纪念品应不为过吧?

当然,我们常说,社区工作是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,原本就繁忙的居委会干部,如此又将增加工作量,尤其在抗击疫情是重中之重的形势下,这就需要问卷调查设计者结合社会实情,用好用筹学视轻重缓急实施。同时,充分发挥智能化大数据的作用,双管齐下,让关系国计民生的问卷调查,真正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的作用。

作为市民,有工作人员向你问卷调查时,还请挤出点宝贵时间回应一下。毕竟,这份问卷调查,可能与你、我、他休戚相关。至于电话调查,以愚之见,不识庐山真面目情况下,拒绝回答为妙。

□张林凤

■法官日记

学习英模

□余 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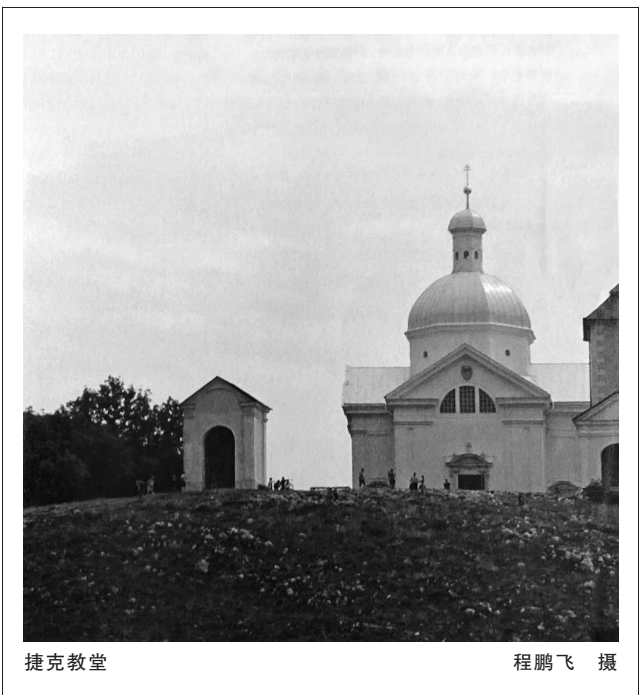
英模,是一个时代最闪亮的精神坐标。《正义之星》专题片讲述了18位英模法官的先进事迹。他们坚定理想信念,坚守初心使命,坚持公平正义,忠诚履职,担当实干,以崇高的法治信仰,深厚的为民情怀,忘我的拼搏奉献,谱写了服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的感人诗篇。

作为一名刑事法官,能够与英模为伍,我深感荣幸,同时也汲取到了强大的奋进力量,时刻向英模看齐,将英模精神铭于心、融于魂、践于行。

学英模甘于奉献,砥砺前行之劲。专题片中,同为刑事法官的范红海同志曾在2019年开庭审理一起扫黑除恶重点案件,连续庭审18天,每天端坐8小时。当年春节,他只给自己放了1天假,此后的11个月,他一天也没有休息。一生择一事,一事为公正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,我时常提醒自己,越是审理大案要案、涉黑涉恶案件,越是要沉下心来,坚持不枉不纵、依法裁判。对每一起案件,都应认真梳理分析案情,耐心听取辩护意见,仔细翻阅卷宗材料,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、证据关、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,办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。

学英模不忘初心,为民服务之情。在基层法院工作了27年的元民川同志刚走上审判岗位时,被安排到一个偏远的山区法庭,办公环境简陋。白天,他跟着老法官深入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察访民情。晚上,他们凑在一起研讨案情、撰写文书。他的一句话让我感触良多:“让法律有温度,让服务更亲民,一张笑脸、一杯热水、一把椅子就能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。”刑事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、涉众型集资诈骗案件时,要自觉站稳人民立场,学习英模对待群众那样,耐心倾听、找准症结、细致沟通、化解对立,争取理解、多做工作、多想办法、展示公正。

学英模坚定信念,改革创新之心。邹碧华同志曾说:“人的一生,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。理想的完满人格,应当是破除自我,将自己融入到人民中,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。无我,党的事业不朽,如是我心。”改革需要破釜沉舟和冲锋陷阵,当仁不让地“当先锋”“打头阵”,不打退堂鼓,不存私心杂念。我要学习邹碧华同志身上那股创新精神,心怀崇高的职业理想,把高度的责任心倾注在守护百姓安宁、捍卫司法公正的过程中,用经得起检验的裁判彰显法律的威严;不惧挑战,既埋头办案,又抬头看路,努力通过办案推动诉讼制度改革和法治进步。



■灯下漫笔

袁世凯称帝时的一段插曲

□沈 栖

民国肇始,孙中山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“再造共和”的“中华华盛顿”。可袁世凯却横下一条心,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出来充当皇帝。最终他死在了举国民众的反抗与唾骂声中,皇帝梦只做了83天。

袁世凯称帝梦的覆灭,不能不论及梁启超及其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。用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:这篇文章“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”。

倘若溯及梁启超的思想脉络,从甲午到戊戌,他是大力宣扬“民政、民权、民智”,尚未正面提出共和政治的主张;从戊戌到辛亥的十多年间,他在孙中山的影响下,虽说认同共和革命,但其主导思想还是承认君主的正当性,是在“虚君”的前提下进行探索。是辛亥革命将梁启超从君主政治的思想引导到共和政治的轨迹。由此,他于1915年端午节前曾当面劝阻袁世

凯摒弃称帝梦想。然而,袁世凯则是“拒谏饰非,作伪术之巧妙,登峰造极,古今无可伦比,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”,于是乎,梁启超在“吾实不能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,除非天夺吾笔,使不复能属文耳”的情境下,写下了直斥“此辈鬼蜮”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宏文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《京报》汉文版刊出,旋即,《国民公报》全文转载,全国各报也闻风响应,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令袁世凯无面目见人。梁启超这篇檄文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,即反对在共和制下改行帝制,从而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。

毋庸置疑,梁启超的文章绝非旨在解决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,而是为了维护共和国体,防止这一国体的被颠覆。袁世凯充分估计到《异哉》一文在政治上可能产生的巨大颠覆性效应,因此作出了行贿的举止。据梁启超事后回忆:“当吾文草成,尚未印发,袁氏已有所闻,托人贿我

以二十万元,令勿印行。余婉谢之,且将该文录寄袁氏”。(《国体战争躬历谈》)袁世凯一意孤行,到头来遭到国人的唾骂,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,遗臭万年!

反观历史。1915年中国面临国体选择的十字路口。《异哉》横空问世,以思想的方式宣判了袁世凯试图走向君主国体的死刑,甚至是宣告了君主国体在中国的终结。在当年,这篇檄文就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政治影响。诚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言:“迨先生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出,摧陷廓清,如拨云雾而睹青天。”当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,通过校友会,把包括《异哉》一文在内的梁启超等人所写的反对帝制的文章翻印成题为《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》的小册子到处散发。可以说,《异哉》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论述,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过直接的政治影响,是其国体与政体思想的主要渊源。